

政策衝突與和平解決

～天安門事件後之中(共)美危機關係～

包 宗 和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研究目的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有所謂的微視衝突理論(microcosmic theories of conflict)與巨視衝突理論(macrocsmic theories of conflict)。而外交決策分析與國際體系分析相比較，則較偏向前者。無論微視與巨視，均與國際衝突與國際和平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外交政策如從理性決策角度考量，通常涉及決策選項與利益評估，從而在代價最小，利益最大的原則下做最佳選擇。故理性模式下的外交決策必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拘泥於某種思維理念的意識型態往往被棄置一旁。畢竟，國家利益是一種動態變數

* 本文初稿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iananmen Incident" 曾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二至十四日於台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所舉辦之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上發表。

(dynamic variable)，經常因時、因地、因物而異；意識型態則為一種靜態變數 (static variable)，由於缺乏因應外在刺激所必需具備的彈性，因而常與國家利益產生衝突。本文最重要的假設即政策衝突兩方，若能保持適度彈性，維持務實態度，當可有助於危機的解除。尤其是不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一方，通常較願意以現實的眼光作出讓步，使危機消弭於無形。此種以理性為基點的務實外交作法，是降低國際衝突，增進國際和平的重要關鍵。本文另一項假設即當危機涉及某一方之重大利益時，其政策迴旋空間即相對縮小，而避免危機升高的關鍵，即繫於較不涉及國家重大利益之對立方能否採取彈性務實的態度，也繫於本身在狹窄的考量空間中能否依然維持某種程度的妥協意願。

全文將以理性決策為主幹，運用遊戲理論(game theory)的概念，剖析天安門事件及兩個月內中共、美國相互間之政策考量，並且完全以利益評估的觀點來測試前述之假設，用能尋求解決政策衝突的答案。而文中觀察期所以界定在事件後兩個月內，主要因為此一時期是雙方關係最不穩定的時期，也是彼此決策考慮的關鍵時刻。

貳、中（共）美關係背景分析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即逐漸邁入冷戰時期。隨著韓戰爆發與中共介入，中（共）美間即呈現高度對立的情勢。此種緊張對峙歷經五〇年代後之杜魯門時期、艾森豪時期、甘迺迪時期

以及詹森時期而無多大變化（註一）。如以 2×2 矩陣圖形分析，雙方最佳選項在於促使對方政治解體，而代之以符合自身意識型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價值，這在冷戰顛峰期尤其具有這方面的心態。雙方最差選項即在觀念、價值與體制上臣服於對方的意識型態，並造成內部政治體系空前的危機。雙方次佳選擇則為保持對立情勢，一方面制阻對方勢力的擴張，一方面徐圖發展；而次差的情況即相互合作，此固可緩和雙方緊張情勢，但在彼此高度猜忌與不信任的情況下，合作不僅根基脆弱，且均認為將予對方以可乘之機。而冷戰時期高度意識型態對立，益增相互合作的困難性。此種情況可以用下面的矩陣圖形表現出來：

表一：中（共）美間之「僵持遊戲」
（一九五〇～一九六八）

		中 共	
		合 作	對 抗
美 國	合 作	3	1
	對 抗	4	2
		1	2

註 一：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台北：三民書局，民七十九年五月），頁三七。

表列數字代表「偏好序列」(preference order)，各方格中左下角為美方之偏好序列，右上角為中共之偏好序列。此一矩陣顯示中(共)美雙方在冷戰時期所進行的是一場「僵持遊戲」，雙方的優勢戰略均為「對抗」，而均衡點則為右下角之(2, 2)。這是一個相當穩定的結果(註二)。

迨尼克森總統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變化。尼克森基於幾項考慮重估美國對中共之政策。首先，越戰使美國人民體認，在遙遠海外從事有限戰爭似乎與國家安全並無密切關聯(註三)，在一片反戰聲中，尼克森希望以中(共)美和解來達到自越南光榮撤退的目的(註四)。

其次，美國既然無法藉軍事力量有效孤立中共，而征服中國大陸又是一件不可想像的行動。中共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保有外交、文化與商業關係，也證明中共政權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註五)。

第三，中共在六〇年代成功地發展出核子武器，對美國形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因而迫切希望能在北京設立長駐機構，以便在任何核子危機中可以與中共統治者立即溝通(註六)。

註二：有關「僵持遊戲」的分析，見拙作，同上，頁七～八。

註三：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6th ed. (N.Y.: Praeger, 1973), pp.261-264.

註四：A Doak Barnett & Edwin O. Reischaue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Next Decade (N.Y.: Praeger, 1970), P.198.

註五：Hans J. Morgenthau, A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N.Y.: Praeger, 1969), pp.201-203.

註六：Jerome Alan Cohen, Edward Friedman and Others.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Dilemma in U.S. — China Relations (N.Y.: Praeger, 1971), P.158.

第四，美蘇間的長期對立，加上中共軍力的增強，使美國興起聯合中共制衡蘇俄的想法。美國一方面希望與中共接近以遏阻蘇俄對中共之壓力，使美國不必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即可獲得亞洲新均衡（註七）。美國同時希望視中共為國際領域中合法的一員，以緩和蘇聯好戰的傾向，迫使蘇聯統治者對美國採取一種更協調的途徑，並以中共來牽制抵消蘇俄部份力量，以減輕美國所承受的壓力。

第五，美國希望藉著與中共間的和解打開中國大陸門戶，以開拓大陸廣大的市場。

基於上述考慮，尼克森總統在對華政策認知上顯然擴大了中（共）美相互合作的益處，增加了相互對抗的害處。根據布諾麥斯吉達的期望效益理論，對立雙方總以對方政策完全與自己配合為最佳選擇，而自己屈服於對方意志力之下則為最差結果（註八）。冷戰時期中共與美國間意識型態的對立，更加凸顯此兩種選項間之兩極化對比。而在次佳與次差選項間，從前述尼克森的政策考慮來看，

註七：Gargi Dutt, "China and the Shift in Super-Power Relations", in Detente: Perspectives and Repercussions. M.S. Agwani (ed.) (New Del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1975), pp.71-72.

註八：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N.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7. 根據布諾麥斯吉達的理論，戰爭中衝突二方戰勝者將使失敗者完全屈從於其意志力之下，因而使敗方完全接受勝方的政策。從國家利益的光譜來看，對方全盤接受自己政策顯然是最佳選擇，反之則為最差選擇。在分析中（共）美關係時，將以布氏此種理論為基礎，再輔以中（共）美長期冷戰的事實據以判定雙方之最佳選項與最差選項。

顯然「相互合作」要較「相互對抗」為佳。

在中共方面，一九七一年初，毛澤東對其幹部言道：「我不信任帝國主義者，但我願意與他們談判。」又言：「我不預期美國會放下屠刀而成佛，但如果美國希望成爲一個現實主義者，我也將成爲一名現實主義者。」（註九）中共態度產生轉變的原因如下。首先，中共與蘇俄自五〇年代末以來逐漸分裂，加之尼克森關島主義中重返孤立主義的傾向，使中共認爲對其安全構成最大威脅者爲蘇俄而非美國（註一〇）。中共並且希望藉中（共）美和解以削弱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註一一），進而打入國際社會之中。中共也希望美國能成爲嚇阻蘇俄在亞洲擴張的力量（註一二）。故至七〇年代初，中共傾向認定與美「相互合作」較「相互對抗」為佳。至於最佳選項與最差選項，則一如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分析，而有兩極化之尖銳對比。故中（共）美一九六八年後之關係可以用下面的矩陣圖形示之：

註九：Claude Buss,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ichard Nixon (N.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P.64.

註一〇：A. Doak Barnett, "The Changing Strategic Balance in Asia", in Sino-American Detent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Gene T. Hsiao (ed.) (N.Y.: Praeger, 1974), P.25.

註一一：David Wils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al Trends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Trade with China: Assessments by Leading Businessmen and Scholars Patrick. M. Boardman (ed.) (N.Y.: Praeger, 1974), P.8.

註一二：Lawrence L. Whette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ss: Lexington Books, 1974), pp.75-76.

表二：中（共）美間之「囚徒困境」遊戲
（一九六九～一九八九）

		中 共	
		合 作	對 抗
美 國	合 作	2, 2	1, 4
	對 抗	4, 1	3, 3

在上述「囚徒困境」賽局中，雙方之優勢戰略均為「對抗」，故均衡點應為（3，3）。然而，證諸美國與中共間在一九六九至一九八九這段觀察期來看，雙方均偏採合作戰略，中共此種趨向則是自一九七九年後方漸趨明顯（註一三）。而中（共）美之所以願意在「困境」中採取合作戰略，除了彼此提升對「相互合作」的評價，貶抑「相互對抗」之價值外，雙方實力的成長與提升，減少了被對方出賣的恐懼，同時也減低了出賣對方之預期成果。加諸長期冷戰所形成的無限賽局展望，益發增加「相互合作」的可能，以求得較「均衡點」更佳的结果（註一四）。故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前，中（共）美關係展現出如下特色：第一，雙方處於一種「

註一三：見拙作，前揭書，頁三七～四〇。

註一四：有關「囚徒困境」分析及其突破困境的方式，詳見拙作，同上，第二章。

相互合作」的和解狀態；第二，此種合作關係是建立在一種現實利益的考量上，即彼此基於現實考慮，而將意識型態，價值觀念上的差距暫時擱置；第三，由於雙方在制度、理念與生活方式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依據布氏「期望效益理論」，政策觀念差距越大，則衝突效益越高，故從國家利益考量，中（共）美間潛存的不信任與對抗性仍然存在，此正可反映在雙方兩極化的偏好序列中。換言之，在「囚徒困境」賽局下，「相互合作」仍舊充滿了變數與不穩定性，而務實外交的採用則為維繫「相互合作」的一項關鍵。一旦有關國家重大利益的情況發生，上述不穩定的合作關係即可能因潛在的對抗性而遭遇困難。

參、美國對天安門事件的立即反應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在天安門血腥鎮壓民運人士，引起全球的注目與指責。在此一個案中，中（共）美關係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也凸顯「囚徒困境」賽局下雙方「相互合作」的不穩定性。

天安門事件爆發後，中共成為美國政府譴責的對象。當時美國國內所提議之制裁包括召回美國駐北京大使、中止美國與中共間的軍事合作與技術移轉計劃，暫時凍結與中共間的關係，以及對中共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等。

為了回應國內對天安門鎮壓行為之指責，布希總統宣佈了對北京之制裁。這些行動包括中止中（共）美雙方軍事領袖的互訪，對

中共留美學生申請延長居留採取優惠措施、透過紅十字會對事件中受傷的大陸同胞給予人道與醫藥協助，以及當中共繼續鎮壓行動時對其他涉及雙邊關係事務加以重估（註一五）。在軍事制裁方面，包括中止政府對政府間之軍售以及商業出口武器，中止中（共）美軍事領袖互訪（註一六）。美國也同意與盟邦共同抵制經由多邊開發銀行貸款給中共的措施（註一七）。布希曾表示，制裁的目的在迫使中共領導者恢復過去的自制政策。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國眾議院以四一八票對零票之壓倒性多數通過對中共之制裁。其建議的行動包括將既有的制裁制定為法律；將武器禁運範圍擴至中共警察使用之裝具；禁止美國衛星提供中共長征火箭發射升空資訊；中止推動美國在中國大陸的貿易與投資機會；禁止美國政府對民間赴中國大陸投資提供新的保證；禁止銷售核子裝備與燃料；敦促行政當局反對任何美國及其盟邦有關高科技售往中國大陸的舉動以及建立一個工作單位以決定如何協助那些分散美國各地又缺乏援助的中國留學生等（註一八）。眾議院顯然希望制裁層面能由軍事擴及經濟層面。而依照眾議院的看法，經濟制裁將為更有效的方式以迫使中共領導者讓步。

註一五："Bush Suspends Weapons Sales to China", A transcript of Bush news conference. Backgrounder (Taipei: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1989), P.1.

註一六：ibid., P.2.

註一七：Richard L. Williams, "U.S. Response to Changes in China",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 October 1989, P.28.

註一八：Don Oberdorfer, "House China Vote Shows Power of Domestic Politics", Washington Post (July 1, 1989), P.A14.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參議院以八一對十票壓倒性多數通過制裁中共。參議院所提供的行動建議與眾議院雷同。國會的積極政策顯示議員支持對北京採取較布希總統更積極的制裁行爲。此種態度已在國會中形成「兩黨外交政策」(bi-partisan foreign policy)。

與國會提議的行動相較，布希總統所採取的制裁中共行爲就顯得較不嚴厲。事實上，天安門事件及美國政府的一連串決定顯示布希總統依然贊成對中共採取謹慎政策。比如布希中止對中共軍售，卻又拒絕國會有關採取更嚴厲措施的要求。布希也避免在事件後立即就方勵之及其家人留駐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一事與中共攤牌，儘管庇護政治犯是美國一貫的政策。美國也同意蘇俄所提避免在聯合國安理會中譴責中共。六月十八日，布希透過白宮發言人傳達信息，表示願意在有利中國人民之時會晤鄧小平。布希要求國會對北京小心將事，並且避免傷及既有的中（共）美友誼。六月廿七日，布希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專訪時即坦率指出，他將不會尋求撤銷所賦予中共之「最惠國待遇」（註一九）。一九八九年七月六日，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 Baker III)呼籲東南亞國協(ASEAN)勿採取孤立中共的行動（註二〇）。同年七月，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

註一九：Don Oberdorfer, "U.S. Criticizes Deng but Seeks to Avoid Showdown on Dissident",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89), P.A20, Also see China Times (June 16, 1989), P.5.
China Times (June 18, 1989), P.1.
Ta Kung Pao (June 28, 1989), P.1.

註二〇：Ming Pao Daily News (June 6, 1989), P.16.

(Brent Scowcroft)以及副國務卿伊格柏格(Lawrence Eagleburger)密訪中共以求突破僵局(註二一)。所有這些行動均顯示布希政府對是否採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顯得瞻前顧後。

總括布希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其最佳選項固然在於能換取中共的全面讓步，釋放所有被捕民運人士，並回到天安門事件前的開放政策。次佳情況即在不傷及中（共）美既有關係的情況下，促使中共放鬆對民運人士的整肅行動，使中共在緊縮政策下能予民運人士較大的生存空間。次差選項即維持現狀，聽任中共繼續其鎮壓行動，畢竟中共此舉涉及中國內政，而無傷美國國家安全與重大利益。最差情況即因堅持對中共實施嚴厲制裁，而無補中共鎮壓政策的緩和，反而損及中（共）美間的戰略關係。

肆、美國維持彈性政策的原因

布希對北京政府的謹慎措施往往被批評為缺乏效力。然而，美國的政策反應表現出一種經過計算過後的自我克制。而造成美國政府採取謹慎政策的原因可歸納為下述幾項：

首先，即使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階層對中國大陸的控制力開始削弱，但是中共現有的政治與軍事系統仍可繼續維持一段時間。換言之，布希當時面臨兩種情況，即一方面必須表現道德上的憤慨，堅決支持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所遺留下來的民主價值傳統

註二一：Paul H. Kreisberg, "The U.S. and Asia in 1989", *Asian Survey*, Vol. XXX, No.1 (January 1990), P.19.

；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效處理美國與中共間的關係，以促進美國的長期利益。這形成決策方面有關人權與現實政治間的衝突（註二二）。由於北京政府已經以武力解決了天安門事件，故華府必須面對若干現實問題。

其次，美國擔憂對北京採取強硬政策可能迫使共黨領導者恢復過去的仇外行動，這將危及東亞乃至於整個世界的安定。副總統奎爾即曾評論道：「我們不願見到局勢回轉至五〇年代或六〇年代中共對西方採取全面敵視的情況，並對鄰國發動民族解放戰爭」。他並且言道：「中共對西方開放已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定作成貢獻。我們與中國人民將繼續分享此種基本戰略利益，一旦此種關係退化，我們彼此均將有所失。」（註二三）

第三，北京強硬派人士並不太關心西方壓力或制裁。嚴厲制裁將促使中共倒回至經改前的黑暗時期。結果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展望將更趨渺茫，而政治反對者的命運也將更加悲慘。總統布希曾言道：「我不希望見到關係完全破裂，我也不願意鼓勵任何導致此種結果的行動。當你們看到這些青年人為民主與自由而奮鬥時，美國如在此時撤退，將他們留給那些預備進一步鎮壓的中共領導

註二二：The Japan Times (June 25, 1989), P.19.

Also see David M. Lampton, "China and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Wake of Tiananmen", A summary report of a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Johnson Foundation, July 7-9, 1989 National Committee, China Policy Series, No.2 (September, 1989), P.16.

註二三：David Hoffmann, "China Executions Push Bush to Focus on Future", Washington Post (June 25, 1989), P.A25.

者手中，則其命運無寧是悲慘的。」（註二四）

第四，美國顧慮對北京採取嚴厲行動將迫使中共重新投入蘇俄的懷抱之中。布希總統繼續其前任的政策，即視中共為潛在對抗蘇聯的力量，此種認知即使在美蘇和解之後依然存在。中（共）蘇恢復親密關係對美國而言不啻為一場惡夢。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認為，一個強大而安定的中國將有利於美國及太平洋地區。而一個脆弱與分裂的中國大陸將助長蘇俄成為亞洲唯一的軍事強權以及日本成為主要的經濟大國。依照尼氏觀點，中（共）美間的友善關係事關美、蘇、中共與日本在亞洲的均衡（註二五）。

第五，美國認為中共是一個處於轉型期的大國。美國的當務之急在鼓勵中共領導者繼續在大陸的經濟改革運動，此種改革終究會造就政治上的改革。美國對中共之嚴厲制裁將迫使後者關閉對西方開放的門戶。

第六，美國認為中共是政治解決中南半島的關鍵，也是推動有助於東南亞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樞紐。布希總統視中共為一個區域大國，其對西方之溫和與友善態度將與區域秩序的維持密切相關（註二六）。

第七，另一項導致美國採取低調的因素即雙方在情報蒐集上的密切合作。美國在中國大陸西部設置有兩個監聽站，其功能在於監

註二四：Washington Post (June 6, 1989), P.A1.

註二五：China Times (June 26, 1989), P.6.

註二六：William T. Tow, "China Crisis Wither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3, 1989), P.19.

督蘇俄飛彈生產調度的情況。這些監聽站對美國加強對蘇軍事計劃之查證工作具有重大功能，特別是美國在一九八〇年被迫關閉其在伊朗的監聽站之後（註二七）。對美國而言，甘冒其在中國大陸之監聽站遭到關閉以施加嚴厲制裁於北京是不智的。

第八，美國不願意失去廣大的中國市場。在此一層面上美國政府所以擱置對中共實施嚴厲經濟制裁實植基於下列幾項因素。首先，過去以相似行動來對抗其他國家證明是無效的。根據胡鮑爾 (Gary Clyde Hufbauer) 與史考特 (Jeffrey J. Schott) 的研究，由某一國家對另一國家實施經濟制裁，只有當後者對前者的貿易量佔其整個對外貿易之二〇%以上時才可能成功。中共對美貿易只佔其總外貿易之一五%，故美國對中共之經濟制效果亦屬有限（註二八）。其次，儘管天安門事件在短期內將使美商赴大陸投資為之裹足，但卻未必能阻礙其長期赴大陸開拓市場的計劃。在美商眼中，經濟制裁只會使他國競爭者獲利（註二九）。在商業上，布希政府擔心美商將因中（共）美友誼受損而遭到傷害。

總之，美國不願意失去經由二十年和解所建立起之對中共影響力。布希政府試圖在現實政治與理想主義間尋求平衡。天安門事件後布希政府對中共之有限與謹慎的制裁顯示出布希與中共領導者個人的友誼以及其周邊高級助理現實主義的傾向，這些取向超越了自

註二七：Youth Daily News (June 27, 1989), P.6.

註二八：Ai Wei,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American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America Monthly, Vol.4, No.4 (August 1989), pp.32-33.

註二九：Lampton, op.cit., P.3.

由與民主，成爲華府的政策指導原則。

事實上，布希通盤的政策考量明顯標示出其決策的選項。比如他希望與中共領導者舉行高峰會談，避免傷及既有關係，不作孤立中共的舉動，派高級官員密訪北京，強調維護東亞安定之戰略利益，防範中共重入蘇俄懷抱，盼望借重中共以解決東南亞區域衝突、與中共保持情報合作、維護中國市場等，均表現出其維繫中(共)美戰略關係的最高原則。至於中共能夠在人權問題上作多大讓步，反成次要問題。對華府領導者而言，能兼顧理想主義與現實政治固爲最佳選項，但如二者不能得兼，則後者優於前者應爲明顯的事實。

伍、中共對美制裁的反應

爲了回應布希總統所宣佈的制裁行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聲明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的批評是完全無法接受的。改革、開放政策與獨立和平外交依然是北京的基本政策。中共希望美國能夠現實到避免損及雙方的既存關係（註三〇）。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發佈逮捕異議人士方勵之及其家人的命令。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並遭中共軍隊包圍（註三一）。中(共)美關係陷入緊張之中。

註三〇：People's Daily News (June 8, 1989), P.1.

註三一：China Times (June 13, 1989), P.3.

六月十四日，北京驅逐兩名美國記者（註三二）。六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府宣佈中共將不會屈服於美國所擬議的制裁之下。北京將對任何制裁施加報復。雖然如此，中國大陸仍然對西方投資者開放（註三三）。

六月二十三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指責外國介入中共內政。他表示中共絕對不會向外界壓力低頭。他並且警告布希干涉中國大陸內政是不智的（註三四）。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通知美國官員，決定無限期展延預訂一九八九年秋季開始的美國和平團隊活動。根據協定，該團原已徵求到二十名美國自願者赴中國西南四川省教導英文（註三五）。

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名在雲南省的美國傳教士被公安人員逮捕，並限於當月月底前離開中國大陸（註三六）。

面對中共對美國的敵對行動，華府選擇了低調態度，並避免使業已退步的中（共）美關係更加惡化。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言道，中（共）美關係依然重要，並且承認中共為天安門事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註三七）。楊尚昆顯然試圖改善已經破產的中共形象。事實上，北京現代化需要美國提供市場、資金與技術。只要美國選擇一個謹慎而自我克制的中國政策，中共即

註三二：United Daily News (June 15, 1989), P.1.

註三三：China Times (June 21, 1989), P.6.

註三四：United Daily News (June 23, 1989), P.1.

註三五：Daniel Southerland, "China Postpones Inauguration of Key U.S. Project", Washington Post (June 27, 1989), pp.A1, A18.

註三六：United Daily News (June 28, 1989), P.4.

註三七：Sing Dao Zih Bao (July 13, 1989), P.2.

不願意與美國破裂。

從前述中共一系列反應來看，中共的首要目標在能維護其政權的安全與生存，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則為次要目標。故其最佳選項是一方面能維持與美國間的既有良好關係，一方面又能將民運徹底鎮壓下去。次佳選項則為在不妨礙中共政權安全的前提下對民運人士採取較寬大的措施，以維繫中（共）美間的關係。最差的情況即接受美國要求的自由民主尺度，如此雖可確保與美國間的友好關係，但卻將嚴重危及中共政權的生存。次差情況即在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的情況下犧牲中（共）美間的戰略關係，以高度鎮壓與整肅來維護內部安定。基本上，北京對中（共）美戰略關係仍相當重視，故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仍願意對民運人士放鬆一步，以確保中（共）美間的關係。

陸、中（共）美賽局

從上述美國與中共間的選項觀察，可以將雙方關係歸納在下表之中：

表三：中（共）美天安門事件甫爆發後之賽局

		中 共	
		合 作	對 抗
美 國	合 作	2 維持與美既有關係，對民運人士採較鬆策略 維持與北京既有關係，避免嚴厲制裁 2	1 在不傷及中（共）美關係的情況下繼續對民運人士採取嚴厲鎮壓 徹底屈服於北京強硬路線之下，中（共）美關係雖可確保，但完全失去美國立場 3
	對 抗	4 徹底屈服於美國壓力之下，中（共）美關係可確保，但中共政權則岌岌可危 在不損及實際利益的情況下，成功地維護了自身的價值 1	3 失去戰略與經濟利益 中（共）美關係惡化 4

從表三可以看出美國所進行的是一場「懦夫遊戲」，而中共所進行的則為「囚徒困境遊戲」（註三八）。表中數字代表雙方之「偏好序列」，各方格左下角者為美國之「偏好序列」，右上角者為中共之「偏好序列」。「合作」代表對對方之要求或期望讓步，「對抗」則代表堅持己見。此一賽局對美方而言，並無「優勢戰略」

註三八：有關「懦夫遊戲」與「囚徒困境」遊戲，見拙作，前揭書，頁八～十，五九～六十。

(dominant strategy)，此正反映出美國在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初徘徊於「合作」與「對抗」之間而難以定奪的心態。中共的「優勢戰略」則為「對抗」，此與中共在事件發生後對美國所採取的一連串強硬措施正相吻合。從賽局來看，當中共決定選擇「對抗」戰略後，美國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性考慮下，唯有採取「合作」戰略，以獲致第三偏好而非第四偏好之結果。換言之，即避免最差的情況出現。美國在面對中共強硬態度時一直採取低姿態，甚至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以及副國務卿伊格柏格祕密訪問北京，均足以證明華府採取「合作」戰略的偏向。

在這場微妙的賽局中，如果中共改採「合作」戰略，美國將可因此得到第二選項之較佳結果，但中共卻會得到第二選項之較差結果，故中共基本上是不願意改變戰略的。好在美國的政治體制特徵是「制衡」(check and balance)。國會的態度可以相當程度地影響總統決策。中共領導者了解美國國會有意對北京實施較嚴厲的制裁行動，故不能排除美國政府在國會壓力下由「合作」轉為「對抗」的可能性。畢竟國會不若自宮那樣專注於美國的戰略利益。設若如此，則中共將獲致「第三選項」而非「第一選項」的結果。如從「削減敵方收益」的角度來看，則中共仍應堅持「對抗戰略」，但若從「擴大己方收益」而言，則在美方有採取「對抗」戰略隱憂時，中共顯然以「合作」戰略提升美方收益（即美方由第三選項轉變第二選項）較為有利。故中共的理性選擇固為「對抗戰略」，但在面對美國國會強大「對抗」壓力下，改採「合作」戰略以便與美國維持「相互合作」關係顯然較為有利，此為中共在七月下旬逐漸軟

化原先強硬態度的原因。故雙方潛存「以牙還牙」戰略終能迫使雙方維持「相互合作」的情勢。此種戰略更由於北京爭取生存以及美國國會的強硬呼聲而達到預警對方的效果。

柒、戰略三角分析

美蘇中共關係自一九七一年尼克森重訂對華政策之後即演變成狄特摩(Lowell Dittmer)所建構的戰略三角關係。依照狄氏觀點，四種可能的三角架構分別是「三邊家族式三角」(menage a trois triangle)、「羅曼蒂克三角」(the romantic triangle)、「結婚型三角」(the marriage triangle)以及「單位否決式三角」(a unit veto triangle)。「三邊家族式三角」是指三方均相互維持肯定關係；「羅曼蒂克三角」是指一方同時與另外兩方維持肯定關係，而後兩者間卻維持否定關係。「結婚型三角」是指某兩方之間維持肯定關係，而同時與第三方維持否定關係。「否定型三角」則指三方均維持相互否定之關係(註三九)。

對每一方而言，最佳狀況是同時與其他兩方維持肯定關係。其次為與其中之一維持肯定關係。最壞的情況是同時與其他二者交惡(註四〇)。自一九八八年蘇俄即同時對中共、美國發動和平攻勢

註三九：有關此四種三角架構的圖形與解釋，詳見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lpyong J. Kim (ed.) (N.Y.: Paragon House, 1987), pp.33-34.

註四〇：有關四種架構的選項，見拙作，前揭書，頁三五～三六。

，而後二者間之關係又早於尼克森總統時期即解凍，故美蘇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前即呈現「三邊家族式三角關係」。在此種三角架構下，中共與美國若恢復負面關係，將使三角架構演變為有利蘇俄而不利中(共)美之「羅曼蒂克型三角」。爲了防止此種較差情況之出現，美國與中共均避免損及雙方既有的關係。此種戰略三角心態適可解釋爲何美國在天安門事件後選擇謹慎的中國政策而中共最終也並未與布希政府絕裂。換言之，中(共)美間之交相指責最終仍以「相互合作」結束，即美國不實施進一步的制裁，而中共也適度放寬對民運人士的整肅行動。

捌、結 論

從本文中我們不難發現美國在天安門事件中遭逢道德價值與現實政治兩難的處境。而在美國決策過程中，現實主義依然凌駕於理想主義之上。本文研究提供了如下結論：第一，中(共)美雙方均宜於維持相互肯定的關係，以避免「三邊家族式三角」演變成「羅曼蒂克型三角」，因而使蘇俄居於關鍵性的有利地位。第二，由於北京政府面臨本身政權生死存亡交替之關，故極不可能對西方徹底讓步。換言之，北京政府寧願失去戰略與經濟利益，也不願完全對美國讓步。中共的理性選擇迫使美國選擇「合作」戰略，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不過對布希政府而言，最佳戰略是一面對中共採取謹慎政策，而另由國會扮演強勢角色。布希政府對中共之讓步在於避免北京回到中(共)美和解前的敵對狀態，而國會所發起的較嚴

厲行動則可迫使中共重估其「對抗」戰略，因而促使其趨向「相互合作」的選擇。布希政府應利用國會的強硬態度作為與中共交涉的籌碼，最終迫使中共放鬆對民運人士的頑強政策。而美國政治制度中的「制衡」特性也助於布希政府在人權與現實政治間尋求平衡。

第三，務實外交政策因有包含對現實妥協的成份，其包容性因彈性加大而增加，有助於國際衝突的解決。第四，從理論層面來看，對立雙方若一方進行的是「囚徒困境」遊戲，另一方進行的是「懦夫遊戲」，則在理性選擇的考慮下，後者會對前者讓步。第五，在雙方對立的賽局中，除非「相互合作」對雙方或某一方會造成相當不利的後果，否則仍為較可期其久遠的一種結果。另一方面，除非「相互合作」是雙方的最佳選擇，否則賽局背後「以牙還牙」戰略的運用，在多種情況下仍是引導雙方維持「相互合作」的一項必要條件。

ABSTRAC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lies in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 First, it was sound for both the US and the PRC to continue their positive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the menage a trois triangle would play the "pivot" role. Second, because of the struggle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for its survival, it was highly impossible to convince Chinese leaders to yield to the West completely. In other words,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ould rather los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an fully concedes to the US. The rational choice of the PRC pushed the US to choose "cooperation" as strategy so that the worst outcome would not emerge. However, it would be wise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choose a prudent policy towards Chinese mainland while the Congress plays a tougher role than what the White House does. The limited concession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 the PRC is to avoid pulling Beijing backward into the period prior to Sino-US detente. However, the harsher actions initiated by Congress can force the PRC to reevaluate its choice of "defection" as dominant strategy and push Beijing to move

towards "mutual cooperati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hould employ the harsh attitude of the Congress as bargaining chips to compell the PRC to relax its hard-line policy towards political opponents. "Check and balance" which characterizes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s, in fact, may facilitate the pursuit of the President Bush for a "balance" between human right and realpolitik.